

纪念黄明信先生

申晓亭

我是1976年年底到国图的，从事蒙古文工作，那时还叫北京图书馆，馆址在北海，民语组办公室在主楼的地下室。黄明信老先生1979到馆，直到1998年离开工作岗位，我与黄先生共事了20年。黄先生是我此生最敬佩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与黄先生朝夕相处的日子是我此生最难忘的。

黄先生学问好，人也好，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来形容黄先生最适合不过。黄先生的学问很高，他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却在拉卜楞寺住了八年，不仅藏语文了得，而且精通藏传佛教，获有拉然巴格西的学位，这是藏传佛教格西中级别最高的学术、显宗中最高学位。不仅如此，黄先生还精通藏传佛教中最深奥难懂的历算学，这里需要现代天文学、数学知识，很少有人能达到这个境界。

黄先生对我的帮助尤其大，在我获得的成果里许多都离不开黄先生的名字。我和黄先生共同署名发表的文章有三篇。应该说这几篇文章的学术水平都是很高的，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第一篇是《蒙古源流成书年代诸说评议》，此文刊登于《民族研究》1987年第6期。《蒙古源流》是一部著名的用蒙古文撰写的蒙古编年史。在古籍整理中发现有关它的成书年代社会上有着两种不同的说法，而且都源于对同一段文字的不同理解。比利时人田清波理解此书写成于作者诞生后的第59年（1662），我们认为田清波忽略了其中“愤怒”一词的性别，阳性愤怒应该理解为时轮历的“胜生周”的第59年，相当于公元1685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歧，主要是：一方面由于蒙古文记录文字的不甚严谨、晦涩难懂、易出歧义，另一方面因为它牵扯到蒙古历、汉历、藏历中有关纪年、纪月、纪日的方法，这些方法纠缠在一起比较复杂，一般学者由于专业的限制，完全理清这些问题不容易。因为有黄先生，我们理清了这

^① 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些问题，我们的论文得到了国内外蒙古学界的认可与重视。1998年9月，相关内容的论文《谈蒙古历与藏历》（蒙古文版）在日本冈山“蒙古传统科学国际讨论会”宣读，其后该论文（蒙文版）刊登于《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01年第2期。

第二篇为《〈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蒙译本〉考》，该论文发表于《文献》1988年第2期。《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蒙译本》木刻板，共37册（我馆藏其复制本）。序言中说：“为了精历算、彰百家、益算者，圣文殊师利康熙皇帝诏谕将此前所未有的历算典籍之精本重新用汉文编写，再用蒙古文翻译刊刻。”《蒙译本》成书于康熙五十年（1711），选译自清康熙八年（1669）清廷制定的时宪历《新法算书》。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蒙译本》被译成藏文，于是有了《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藏译本》，时宪历自此传入西藏，之后形成藏传时宪历，用以推算日月食，至今保持不变。该论文包括三部分内容：书名与卷次、序文译注、源与流。

第三篇为《藏历蒙古历汉历》。该论文就与蒙古历有关的几个具体问题——《蒙古源流》成书年代问题、俺达汗出生日期问题、霍尔月问题、时宪历的引进问题——系统谈及藏历、蒙古历、汉历的某些原理和方法，包括纪年法、纪月法、纪日法及日月食推算法等问题，进而阐明藏历、蒙古历、汉历各自的特点以及三者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其实这已经是相关内容的第三稿了。该论文的第一稿就是上述提到的参加了日本冈山国际会议的《谈蒙古历与藏历》（蒙古文版）。其后又修改了第二稿《蒙古历藏历汉历例说》，发表于《蒙古学集刊》2005年第一期。再后就是这个第三稿。《藏历蒙古历汉历》于2006年10月被收入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加强藏学研究发展藏族科技——第七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会议论文集》。可见此论文内容的社会认知度之高。三稿主要内容相同，蒙古文版的第4部分“时宪历的引进”，多了一些日食、月食的观测数据比较，但没有后两稿的第5部分“汉、藏、蒙历法源流探索点滴”。由于这篇论文着重于阐述藏历与汉历的历法原理，是黄先生写的初稿，我的工作主要是文字整理、修改和蒙译。

其后，在蒙古文古籍编目中，在翻译佛教人物传记中，我还是往往会拿些难解的佛教名词去叨扰黄先生，黄先生一如既往给与指点。

能与黄先生合作是我的幸运和荣幸。

黄先生除了学识极其渊博、治学一丝不苟、对工作有极大热情和极端负责之外，最感人的就是平易近人、有求必应、诲人不倦。那时，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学子，总是带着诸多问题请教黄先生，而黄先生从不嫌弃我知识浅薄，总是问一答三，倾囊相授，使我受益终生。

黄先生为人正直、谦和，丝毫没有学术界的某些臭毛病。记得蒙古源流成书年代那篇文章发表时，他曾提议由我做第一作者，说将来对我的进步有好处，我很感动……

我与黄先生的合作还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是研究藏文、藏学的，我是学蒙古文、蒙古学的，我们的合作，实际上也是藏文、藏学与蒙古文、蒙古学的横向合作，促进了蒙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对于黄先生这样德高望重又给我许多帮助的人，我总是心怀尊敬，心存感激。黄先生退休后，基本上每年12月他过生日的时候，都要去看望他。

更使我叹服的是，八九十岁的人了，仍然在工作，在从事研究，在为他人、为社会发光发热。开始他还能侃侃而谈，还能坐在写字台前操作电脑，后来身体实在不行了，寸步难行，就把电脑搬到了床头小桌上……

去年12月，我又去看望他，门锁着，扑了个空，我心中十分不安。今年再见到他时已面目全非，虽几乎不能言，但头脑还清楚，认出了我。

如今，百岁藏学泰斗黄明信先生走了，悲痛之心难以言表，借此诗表达对他的怀念：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我不知道今后到哪里去看望您，但我会永远记得您。

走好，尊敬的黄先生。

2017年6月11日



2016年1月1日与黄先生的合影

(原载《中国藏学》2017年第3期)